

京口闸和京口驿遗址出土碑刻之

《镇江府永禁奸徒劫夺纸布商人货物碑》

镇江考古那些事儿

《镇江府永禁奸徒劫夺纸布商人货物碑》是42名纸布商人为了避免货物被抢而请求官府竖立。碑文讲到，船头李文和张元、王德甫等一帮地棍目无法纪，勾结座船上的官差，假冒官员的旗牌官，狐假虎威，经常在苏州、京口强行将客商的货物搬上船后扬长而去，此举与抢夺无异，客商苦不堪言。朝廷对这种扰乱江防、扰害商民的事情极为重视。操抚部院李日芄曾向顺治帝上疏，顺治帝下旨要求督抚严拿参奏。兵部要求镇江府海防厅督促丹徒县在京口立石示禁。海防同知收到指示后，认为事关重大，应当会同镇江知府、粮捕通判一起办理。从总督部院、操抚部院、巡抚部院、常镇兵道的批语中可知，惯犯李文被缉捕归案，受到重惩，被施枷审讯责罚，刺配到棠邑驿站服苦役，但张元、王德甫等人在逃。此外，总督部院的咨文说，由于座船上有武弁也违犯法纪，执械张旗，打着官府的名义强抢商人货物，刑科给事中将此事向朝廷上题本奏明，朝廷又下旨要求督抚严察具奏。根据指示，镇江府勒石禁笮，将朝廷的圣旨刻石颁布。

碑文中提及了当时的一些官员，以及闽、浙和南翔的纸布贸易和水运、关税等相关史实。

根据《乾隆镇江府志》、《乾隆江南通志》和《清史稿》等志书推测，“江南镇江府海防同知马”应为马呈图，“山西忻州人，举人，顺治十年任”；“操抚部院李”应为安徽巡抚李日芄，“奉天人，顺治七年任，以后操抚兼管”；“本府知府刘”应为刘芳烈，“字凝远，宛平籍，山东滨州人，官生，顺治七年任”；“粮捕通判魏”似为魏观颀，“河南太康人”；“总督部院马”应为江南总督马国柱，“奉天人，顺治四年总督三省（江南、江西、河南）”；“巡抚部院周”应为江苏巡抚周国佐，“奉天人，顺治九年任”；“常镇兵道胡”推测应为胡亶，“进士，顺治十年任”，“字葆林，仁和人，分守常镇道，凡赋税狱讼事至，立剖，以执法不阿见称”；“刑科林”似为林起龙，“顺天大兴人。顺治三年进士，授吏科给事中”，“十一年，转刑科，加大理寺丞銜”。

碑文中提到商人采购的纸、布主要来自“闽、浙、南翔”。闽、浙多山区，林业资源丰富，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原料。清时，福建是全国重要产纸大省，福建纸因价廉物美行销全国，如“顺昌的纸张‘行至京都’，将乐的书纸远销湖广和江西，邵武的竹纸‘纸客有运至江西、广东、福州者’”。浙江“各山区县产竹地区均有纸厂，而尤以杭州府的富阳，衢州府的江山、常山、开化和龙游等地造纸业最为发达，成为当时造纸业的重要基地”。明清时，苏松地区是全国瞩目的棉花产区，棉纺织业非常发达。南翔镇属于苏州府嘉定县，这里盛产一种刷线的棉布，“名‘扣布’，光洁而厚，制衣被耐久。远方珍之。布商各字号俱在镇，鉴择尤精，故里中所织甲一邑”。南翔的布商字号经营者多为徽商，他们收购棉布后转运至江淮、临清等地出售，营业额在嘉定一县中遥遥领先，当时人说：“布商莫盛于南翔。”

《丹徒县永禁奸船地棍坑害米豆商人碑》提到了镇江至苏州的水路，《镇江府永禁奸徒劫夺纸布商人货物碑》则提到了闽、浙和南翔至苏州、镇江的水路。

具体路线可从著于明朝的《天下水陆路

程》一书得知。其中从“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”为：“自南京至常山县，皆水”，其中杭州至常山段水路为“北关门武林驿。三十里江口浙江水驿。一百三十里会江驿。富阳县。百二十里桐江驿。桐庐县。过钓台，一百里严州府建德县富春驿。西去衢州府。西南一百里濂水驿。兰溪县。东五十里至金华府。西南九十里亭步驿。龙游县。七十里衢州府西安县。上杭埠驿。南去浦城县。西八十里广济驿。常山县”。常山位于闽、浙交界地带，属于衢州府。衢州府由浦城县可至福建的建宁府：“上杭埠。水。九十里江山县。十五里清湖。路。十五里石门街。十五里江郎山。十里峡口。渡。十里观音阁。十五里保安桥。十里仙霞岭。巡司。十里杨姑岭。十里龙溪口。十里下溪口。十里南楼。闽、浙界。十五里大竿岭。十里五显庙。五里梨园岭。十里鱼梁街。十里仙阳街。三十里浦城县。下船。八十里水吉。巡司。七十里叶坊驿。五十里建宁府”。此段商路除了有40里陆路外，其余皆为水路。

从杭州府官塘北上镇江的水道则为：“钱塘江口。万松岭。凤山门。朝天门。吴山。共二十里。武林驿。北关门。十里德胜坝。五里北新关。四十五里武林港。西北百里至湖州府。北五里塘栖。九里落瓜桥。九里五黄桥。五里双桥。二座。九里大茅桥。九里宋老桥。一里远店桥。八里崇德县。二十里石门。二十里皂林。二十里斗门。东五里至濮院。北二十里嘉兴府。东去松江百二十里。北五十里杉青闸。三十里王江泾。三十里平望。西去湖州府。北二十里八尺。二十里吴江县。二十里尹山桥。十里灭渡桥。十里盘门。五里胥门。五里苏州府阊门。十里枫桥。寒山寺。二十里浒墅关。二十里望亭。二十里新安。二十七里无锡县。十里至惠山第二泉。北十里高桥。出夏港。十五里洛社。二十里横林。三十五里常州府。十五里洞子河。十五里奔牛。出孟河，七十里至江口。北二十里吕城。五十里丹阳县。三十里新丰。三十里丹徒。镇江水小，于此搭江船亦可。百二十里镇江府”。

明代晚期编撰的《士商类要》中则载有苏州由太仓至南翔镇的水路：“苏州娄门外搭船，沿娄江东行30里至夷亭（今唯亭），10里至进义巴城巡司，继续东行20里至昆山，40里至太仓州西门，自太仓沿盐铁塘南下行28里至葛龙庙镇（今葛隆），8里至外冈，自外冈沿西练祁河东行12里至嘉定县，沿横泾南下行24里至南翔”。这条水路所经过的昆山、太仓、外冈、嘉定等地，与南翔一样，都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重要的棉纺织品产地，可见这是一条重要的棉布贸易路线。

明代，政府在运河和长江这两条重要商道的要冲之处设立钞关，主要征收船钞和商税。“船钞是由户部向运输者征收的税银，征收的标准是船的宽度，由船主付税。商税是由各省官员向所有由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商品征收，由商人付税”。清代的榷关制度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。顺治时全国有19个户部钞关，是明末的2倍。碑文中的纸布商人雇船从闽、浙经运河北上，会经过浙江北新关、江苏浒墅关等榷关，须交纳船料与货税。北新关设于杭州府武林门外，附近水陆要口设立分关，在城中、城北、西溪、板桥等14处口岸征收税银。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长洲县浒墅镇，口岸有三桥七港、严塘、庄桥、横塘桥、杨尖、九里桥、六市等处，其中浒墅大关、福山、徐六泾、七丫港征税。

（蓝旻虹 霍强 沙艳秋）



宋代泥塑童戏像 玩耍嬉闹的“芭比娃娃”



镇江宝藏

形态质朴、雅俗共赏的泥塑，体现了劳动人民精湛的手工艺，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人类是由女娲抟土捏制而来。民间更以泥塑祈求平安，驱邪避灾。

泥塑艺术在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，考古工作者从两汉墓葬中发掘了大量的陶俑、陶兽、陶马车、陶船。泥塑艺术于唐代达到顶峰，发展到宋代，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，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，许多手艺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，形成制作、售卖一条龙“前店后坊”特色。元代之后，历经明、清、民国，泥塑艺术品仍然流传不衰，尤其是小型泥塑，既可观赏陈设，又可供儿童玩耍，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生产。

泥塑玩具，古人称作“泥货”，人型的则叫“土偶儿”，是中国的传统玩具。宋代手工业、商业的发达，以及城市集镇的相对集中和繁华，推动了泥塑行当的发展。孟元老所著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，北宋东京每逢七夕，街头“皆卖摩侯罗，乃小塑土偶耳”。“小塑土偶”即泥塑儿童像，又被称为“磨喝乐”，是孩子们喜欢的玩具，犹如现在的“芭比娃娃”，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“乞巧”，达官贵人也会买回去供奉玩耍。

镇江博物馆收藏了一组五个宋代儿童泥塑像，先后于1976年和1996年在镇江五条街小学一处宋代遗址上发现，附近同时还发现了宋、元时期的泥塑手工作坊遗址。五个宋代泥孩儿全部为男娃，光头，着开襟薄衣，神态、造型、动作各异，生动地再现了一幅儿童玩耍嬉闹的场景：一娃作被摔倒之状，仰面，张开双手，两脚上蹬；一娃趴在地上，双手一前一

后，屁股撅起，双脚弯曲，似匍匐前进；一娃双手抄袖而立，面无表情；一娃冷静沉着地站着，左手握拳，右手在下；还有一个坐在地上，头歪向一边，似乎在发表演说。五个男孩栩栩如生，体形准确，表情丰富，欢愉之态跃然而出。

这些泥娃娃，均用黄黑色细泥捏塑后烧制而成，通体未施釉，个别地方略施彩绘，传神而富有趣味。部分泥塑身后有“吴郡包成祖”“平江包成祖”“平江孙荣”等楷书阴文戳记。吴郡、平江均为宋代苏州的别称，包成祖、孙荣应为当时的捏塑名匠。这与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言的“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”相吻合，物勒工名的方式，让我们知道了作者的姓名，印证了泥孩儿的时代。

泥塑原材料以泥为主，较容易取材，价格也相对低廉。“七夕”是宋元玩具制作和买卖的高峰。每逢七月初六、初七日晚，市民多结彩楼于庭，唤作“乞巧楼”，放置“磨喝乐”，作乞巧之用。“磨喝乐”是梵文音译，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儿子，佛教天龙八部之一，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汉化，由蛇首人身的形象演化为可爱的儿童形象，具有祈子、宜男之意。

泥孩儿在民间礼俗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是乞求子嗣。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深深影响着社会行为和风气，百姓无不期盼生男孩传宗接代，因此，民间流行供奉“泥孩儿”祈子的习俗。

泥孩儿虽在宋代形成一定的制作规模，但因其原料是泥土，难以存世。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泥孩儿，均为手工捏制而成，在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中数量、质量、种类均处于前列，并且科学发掘于当时的作坊遗址，实属难能可贵，是反映镇江地区其时社会生产、生活情况的重要文物。

（马彦如 张剑）